

中國現代文學的 幾個問題

龍寶麒

一、理論的貧乏

身爲一個中國的現代人要想批評一下中國的現代文學，在別人聽來或許會說：

「這個抱負真不小，這個理想也很可愛，可是你們會來帶主觀的意識和私人的感情，尤其在你們要給中國現代的文學作品和作家做價值判斷的時候。」

中國人是很懂得這個道理的，曹丕在他的典論論文中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孔子和孟子對別人的學說就攻擊得淋漓盡致，尤其是孟子，他罵墨子兼愛，是謂無父，朱子爲我，是謂無君，無父無君，是謂禽獸也，這樣批評同時代的人，似乎刻薄得過份點，但，不正是「文人相輕」的心理一個很好的說明嗎？就是連聖人也不例外。現代人說得更露骨些：「文章是自己的好。」

中國人一方面很懂得這個道理，另一方面中國人又是一個講恕道的民族，所以中國古代儘管有很多的文學創作，但文學的批評實在少之又少，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的文人儘可能不去碰文學理論的邊

，因為談到理論，就要產生批評與褒貶，就傷感情和氣。當然中國文人不是沒有文學理論與批評，但大家多放在心裏，不肯說出來。

自從董仲舒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韓愈提倡文起八代之衰、朱熹註四書，中國的文人是板起臉孔來寫文章的，所謂言必稱堯舜，道必稱孔孟，中國甚至連諷刺文學都不發達，不像希臘的神話，連天上的諸神，都充滿了詼諧和笑謔，與凡人的情慾。由這點看來，中國古代文人所懸掛的標準，比西方神的地位還要崇高。中國的文學坦白的說沒有什麼進步，如果我們把詩經、楚辭所表現的文學水準

作為批判標準的話，二、三千年來的表現似乎也太貧乏了些。這很使人懷念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那真是中國文學史上黃金的年華。為什麼中國文學會像蝸牛一樣底慢慢爬？有時還要停下來，甚至於倒退幾步，我想，中國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不夠發達是主要原因吧？

這個現象到現在還是一樣，就以文學理論的書籍來說，除了市面上在書店裏放來放去都是那幾本老的翻譯本外，真的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學理論創作，可以說是一本也沒有！我甚至可以大膽底說，關於這方面的題材，就是像樣點的文學也沒有。

二、對權威的臣伏

今天，我們也流行所謂的書評，尤其要找有名、有地位的人作書評，似乎愈找到有名的人作書評，這本書的價值就越高，我經常懷疑這些被找的人，有否把書仔細讀一遍，甚至把書中的目次用心底去看一下。這個現象看似沒有什麼，但正說明了一點，不但是我們的讀者一味盲目地崇拜權勢與地位，連我們的作家也都一樣。在國外，如果一個做官的人說了幾句恭維的話，作家立刻深怕他的學術地位被沾污了。但，在中國正相反，大家都認為官做得愈大，學問就愈大，文章就寫得愈好，

文學的理論就愈高超，作家們來求寫書評的就愈多。

我很奇怪，為什麼我們的作家要千方百計底攀附權貴，等一篇內容空洞、言之無物的書評。他為什麼不在這段時間裏去和中學生、阿兵哥、麵攤老板、計程車司機、家庭主婦去談談，問問他們的看法。也許別人以為我在說笑話，一點也不，白居易的詩就是和那些社會中下層的人物接觸而寫成的，在我的讀者當中，恐怕還沒有誰自認比白居易還偉大吧？

大家可別以為我在損那些大官貴人，其實一點也不，因為做官的人，最重要的是為民衆服務，為社會謀福

利，他的詩寫得不好，文學理論不够高深，並不重要。衆人的問題，大衆的公害，

應該去找他們，但如果寫文章，談學術也去找他們，正如去和藝術家談把海水變淡，和會計師談雕塑，和音樂家談大氣污染，和醫生談抽象畫。當然，在達官貴人中，也有不少真正的大學問家、大文豪，不過他們畢竟是少數，然後我們還要問，他們是否有這個心情和時間來為別人寫評作序。一個日理萬機的部長，天天吟詩賦對，公認是當代最偉大的文豪，我會懷疑他是一位良好的部長。我就知道很多大官，他們絕不隨便附庸文人的風雅，我並不因此輕視他們，

相反底，我認為他們已經具備了要成為良好官吏的一個條件。

崇拜權勢、地位與金錢，這是經濟發達、工商繁榮社會的一個自然現象，由於大家有追求財富名利的心理，才能推動這個社會，但這種心理却有害於文學。文學應該是渺視權威，與現實對抗，追求一個高蹈的理想，燃燒生命熱烈的火焰，尋找精神上最高境界的滿足。當然，文學的任務也在反映社會的現象，但這種反映，必須要透過作家的意識，否則那和報紙的社會新聞有什麼差別呢？我也不否認這種文學的心理有害於工商業社會的進化，因此，一個社會應

該同時存在這兩種心理與意識，一個機械呆板，無情冷酷的競爭社會，會因過度的緊張、煩忙、疲乏而趨於瓦解，文藝心理與意識，正好有調劑的作用。

我們的作家似乎忘記做爲一個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責任，因此他們是脫離了現實社會，脫離了廣大的羣衆，他們把自己的意識型態鎖在一個象牙塔裏，他們眼睛所看到的只是孤立在人海當中的幾個高高在上的小點子，他們會熟知目前的政治行情，某當權者的身價，而無視於四周的黎庶。

三、文學的鴉片

要怎樣去寫書評？不但

要讀過那本書，而且要有深刻獨到的看法，並忠於自己的看法，勇敢負責的寫出來。寫書評不比寫書容易，寫書要有充實的資料，科學的處理方法，客觀求真的態度；寫書評需要有智慧的審見，它的目標在求美、求好，需要有主觀的看法，現在的書評人，千篇一律，說上一大堆恭維的客套，然後才在快要結束的時候，略帶幾句明貶暗褒的話，試問這種「花籃文學」又有什麼意義與價值？他又有什麼資格來寫書評呢？又怎對得起廣大的讀者？

一個作家不願接受別人的批評，不願請那些肯說真心話的人發表意見，他的作

品又怎能經得起考驗呢？試問一個作家在自己的著作裏附着一大堆歌頌的文字，另一個作家則在自己的著作裏展排出許多中肯的批評，究竟那一個創作的態度嚴謹？那一個作品較爲有被接受的價值？我們的作家與讀者似乎不太了解這個道理。批評某書的缺點就會影響它的銷路嗎？試問那一本書是十全十美的？對我來說，這反而激起我讀這本書的衝動呢。我反要看看那些批評究竟有沒有道理，並把自己拿來比較比較，是否也犯了同樣的缺點與毛病。我們對一本書的價值觀念當然不會被一篇書評所左右，但它可以爲我們提供參考，它更重要的

一個任務是糾正作家、督促作家，不斷去追求更完美的作品，我們的書評能發揮這個作用嗎？

記得我在沒有出國以前，我很喜歡看影評，我從初中看到大學，後來才發現那些影評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年年寫的東西都是一樣，都是那些老句子、老字眼，在那裏翻來覆去，排列組合，其中也故意夾帶些好像行家的術語，而這批影評人其實只是把外行的讀者當猴子耍，我正是這些受害人之一，而這批影評家目前已成為我們中華民國電影理論的權威。有時，報紙也偶爾登些觀衆的影評廣告，我發現他們已經找到忠實的接班人

，臺灣的第二代在意識上與思想上已向他們宣誓效忠，這使我不得不說：「我們的書評與影評正是我們文藝的鴉片和嗎啡。」

儘管鴉片和嗎啡是毒藥，但有很多人喜歡它的，有很多人不知不覺中上了癮都不知道。我們現在有很多人，動輒列舉自己的光榮記錄，某某博士，曾擔任何種顯要的職務，得過多少榮銜，花了多少時間，多少心血來完成這部巨構，自己的作品以往如何受到重視，自己在文壇的聲譽如何高，在學術界的行情如何的好，他自己的作品對社會有多大貢獻，對時代有多深的影響，然後才虛偽底謙遜幾句，爲

的是烘托上面的文字，來加深讀者的印象。至於作品的意識型態，價值判斷，思想境界，寫作技巧，不是忽略不提，就是聊備一格，說些風花雪月，不痛不癢的話。

一個作家眼睛所看到的全是自己的優點，我敢斷定他的作品是膚淺的，是鬆弛的，因為他的思路已被他自己的滿足自大所蔽塞，他寫作的態度必定是浮躁的。

四、商業的奴婢

我在國內做學生的時代，最喜歡逛書店買書，很多書我雖然不看，也把它買來，因為它便宜，有的暢銷書只要十塊八塊臺幣，翻版書不過三、四十臺幣，天天逛

書攤買書買得不亦樂乎。那時，美國朝野正爲我國的翻版書一再提出抗議，國內的作家也爲盜印提出控訴並在文字上大張撻伐。當然，我在內心裏是偏袒書商的，我想如果沒有這些書商，我這個窮學生豈有買書的權利？於是就巴不得書商官司打贏，因爲他們是我們社會裏文明的傳播者。

我相信和我抱相同心理的人多的是，這就是爲什麼翻印、盜印的風氣，在我們的社會裏日盛一日的緣故。當然，如果沒有翻印、盜印，我們立刻要花多幾倍的價錢去購買，有誰願意？這是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

但，問題的關鍵就在這

裏，長期以來，在我們的社會裏，略有些價值的書一出現，就被人翻印、盜印去了，作者的智慧、心血都變成替出版商人撈刮財富的工具，日子一久，有誰還願意殫精竭智底去從事寫作？當然，我們的思想落後，學術不發達，我們在各方面不如別人，我們可以享受花只是別國幾分之一的價錢來買書，但，我們國民的平均所得，也只有別的國家的幾分之一，我們的國民，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蒙受了利益沒有？我們享受短時的眼前可以計算的利益，但扼殺了整個文化的生機，也破壞了整個社會演進的程序。這個當中，得益的是誰？是那些書

商，在臺灣因這樣而賺錢致富，盈利超過千萬臺幣者，至少有十家書商以上，唯一得利的就是這一小部份人。

我們政府不應該由於國民購買力薄弱而縱容書商盜印、翻印，我們不但要保障本國作家的利益，同時應該保障外國作家的利益，我們付出一部份版權費，絕不是我們社會的損失，因爲這本書所帶給我們社會的益處，已超過我們所付出的金錢。其次，我們最重要的是樹立一個學術尊貴的傳統，與智識地位的崇高性，鼓勵與鞭策我們的學術界、智識份子負起領導社會進化的任務，及迎接當今世界第一流思想的挑戰，這樣我們的文學才

有前途，我們的民族才有希望。

如果由於繳付外國作家的版稅因而使該書售價太高，讀者無力購買的話，那麼我們就應該交由國家的印書公司承印，以虧本的方式介紹給同胞，這是很有意義而應該做的工作。

五、稿費制度的枷鎖

目前，我們臺灣的稿費制度是按字給酬，稿費從每千字八十元到二百元不等，詩則按篇數及長短來計算。有的報社與雜誌社計算得相當刻薄，連空格都不算，在這種情形下，一個作家實在很難靠此維持生活，必然要

奔波忙碌，他創作的天才與慾望就被機械的工作，刻板的生活，無意義的應酬磨揮殆盡。

在這種稿費制度下，作家只好從事長篇小說或言情的、武俠的、黑社會的、甚至誨淫的。我們的散文和短篇小說的生路是完全被扼殺了，死氣沉沉，有那一個作家願意花巨大的心血與漫長的時間去琢磨呢？我自己就是過來人，我曾試驗寫散文和短篇小說，一來由於這是工業社會所應該發展的一個方向，二來也是由於「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文學抱負所驅使，但，寫不到第十篇，我就收手了。因為每篇的稿酬平均只有二百到二百

五臺幣，我用同樣的時間，可以寫成五萬字的言情小說，或是武俠小說（如果我願意的話），稿費是廿倍。我的經濟情形並不好，但我始終不以稿費維生，由於讀書的關係，若是為了這薄薄的報酬，放下許多重要的工作，絕不是一個留學生所能負擔的。

我想，最可憐的還是寫文學理論的和文學批評的，（也就是我個人興趣之所在），一天到晚敲破腦袋，挖空心思，每一個月，真正算得了創作的，最多不過寫出一、二篇罷了，所得到的稿酬不過一千臺幣而已，還要扣去郵費，寫出來的稿未必是能被發表的，稿件自身的

缺點是原因之一，但雜誌社不願意得罪人是更重要的原因，尤其你所批評的是名作家的話。即使僥倖登出來，收到稿費也是三個月以後的事情。

結果是，寫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的人，編輯看了搖頭，讀者覺得枯燥、冷僻，曲調太高，作家們討厭你，視你為不受歡迎的人物，出版商恨你，因為他辛苦捧出來的偶像，被你戳破了，你砍掉他的搖錢樹，他豈會輕易饒了你。這批人只好孤立在茫茫的人海裏，改行的改行，轉業的轉業。

結果是，我們只重寫作而不重創作，只重捧場而不重批評，只重閱讀而不重欣

賞，只重出版而不重選擇，只重數量而不重質量，只重技巧而不重理論。在我們的社會裏有出版商人、文化販子、寫作匠，但卻沒有文學思想學、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文藝哲學家。我們的讀者只知道機械的閱讀，而不知道如何去消化吸收。

如果我有權利來建立我們的稿費制度的話，我一定提高理論性、批評性、學術性、思想性、散文、短篇小說的稿酬，鼓勵我們的作家向這個方向發展。我會成立一個寫稿委員會，在不知道作者姓名下，按質核酬，每年或每六個月再做一次評審，挑出最好的稿件，發給獎金，鼓勵作家用嚴肅的態度

去創造完美的作品。這雖然會增加雜誌或報社的負擔，但我敢擔保它一定會因此而大大地提高其文學的水準，得到更多的讀者，也負起為我們的社會培養更多優秀作家的任務。

六、時代心理與地

理因素

我們談中國的現代文學，首先我們應對這個題目做一個界說，中國的現代文學自然要包括大陸的文學，由於它在型態上與我們相差甚遠，所以很難放在一起討論。因此我們只能談一談在中華民國政府下所表現的文學型態與文藝現象。其次談到「現代」的含義，我想「

現代」一詞的含義，應指政府撤退到臺灣之後一直到現在，因為這段時間比較有獨立性與完整性。

每一個時代都有其心理的特徵，這是由於歷史文化，社會處境與生活條件所形成，這時代心理的特徵支配着文藝的發展。要想了解中國的現代文學，不得不討論這個問題。

生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人，正好面臨着幾個歷史轉變的焦點，從專制帝政，到軍閥割據，而到民主政治的學步階段；從內戰、黨爭、禦侮，世界大戰而到全球性的對立；從農業經濟，手工業社會，而到工商業之前的過渡時期；從封閉的社會

而到半開放性的社會，這所說的封閉，不僅是政治的與社會的，也是思想意識的保守。

在這個文化融合，歷史轉變，社會進化，心理遽變的過程裏，許多的問題接踵到來，現象混亂而複雜，前途晦暗不明，精神苦悶，心靈空虛，我們的情緒難安，我們的態度浮躁。

臺灣處於亞熱帶，氣候炎熱，容易早熟，感情衝動而不穩定，體能容易衰疲。地理環境面臨海洋，島國思想的型態活潑有餘，剛健不足，富於想像力。臺灣的氣候寒暑不定，經常有颱風、地震，使精神緊張而略帶神經質，這些和我們文學的發

展都有很深切的關係。

我們了解我們自身文學的缺點與環境，就應該根據這些來改造我們的文學，創造我們自己文學的新生命。

——寄自己黎

年度小說選

(57——61年，共5冊)

優待本刊讀者，五冊合購65元

劃撥19274號書評書目社

*「62年短篇小說選」正由林柏燕編選中